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互动 调适与重构

HUDONG TIAOSHI YU CHONGGOU

杨文炯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互动 调适与重构

——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杨文炯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互动 调适与重构: 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 杨文炯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5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076 - 7

I. 互… II. 杨… III. 回族—社区—研究—西北地区 IV. 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82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 //www. mzcbs. com](http://www.mzcb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9. 75 字数: 67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105 - 10076 - 7/D · 159

(汉 249) 定价: 89. 80 元

编委会主任：杨建新
编委：马曼丽 王希隆 王洲塔
徐黎丽 赵利生 李 静
杨文炯 武 沐 切 排

序

杨建新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学专著就达八十多部。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成果。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多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民族学（Ethnology）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学术界时，初译为“人类学”、“民种学”。至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始将其译为“民族学”。这一译称虽不完全符合希腊文的原意，也没有紧扣该学科在西方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民族学”这一译称，却十分符合中国的实际。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了“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

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炼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

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联，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平等、和谐发展。

2. 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3. 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 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 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的主流愿望。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2009年4月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都市人类学与城市回族社区研究 (1)
- 第二节 研究的主题、思路与意义 (4)
- 第三节 城市回族社区研究现状与评述 (11)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城市化的“我”和都市回族社区研究 (52)

第二章 城市族群地图中的回族社区

- 第一节 城市族群地图与回族 (74)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回族分布与城市化 (113)
- 第三节 城市回族社区的类型 (122)

第三章 回族社区 (Jamaat)：时间、空间与文化

- 第一节 Jamaat：族群社区与族群边界 (135)
- 第二节 Jamaat—Umaah：文化移植与民族文化范式 (148)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和回族文化变迁 ... (183)

第四章 流动中建构的文化模式：回族社会的网络结构

- 第一节 “库拉圈”、“社网图”与回族社会 (202)
- 第二节 回族社区内部互动的社会网络结构 (209)
- 第三节 跨区域回族社区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 (223)

第五章 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地缘结构变迁研究

- 第一节 社区地缘变迁：都市社区发展中的普遍现象 (311)



第二节	西北城市回族社区的地缘结构	(314)
第三节	城市回族社区地缘变迁动因的分析	(411)
第四节	城市回族社区地缘变迁的势向与文化影响	(430)

第六章 西北城市回族社区社缘变迁研究

第一节	城市社区与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	(452)
第二节	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	(457)
第三节	回族文化与城市回族经济的发展	(495)
第四节	女学：经堂教育的拓展与文化遗产的双轨结构 ...	(509)
第五节	城市回族家庭结构的变迁与文化遗产的影响	(521)

第七章 西北城市回族教育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第一节	回族教育：城市社会的一块“低地”	(528)
第二节	三城市回族穆斯林教育的调查与分析	(537)
第三节	城市回族穆斯林教育的综合研究与建议	(553)

第八章 城市回族社区的媒体文化研究

第一节	媒体、媒体文化与城市回族社区	(565)
第二节	城市回族社区的媒体类型	(575)
第三节	《开拓》杂志：城市回族穆斯林媒体文化的 典型个案	(596)

第九章 结语：城市界面下的回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参考文献	(613)
------------	-------

后 记	(627)
-----------	-------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都市人类学与城市回族社区研究

一、都市人类学和城市化的“田野”

20 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从理论到方法在相互影响和借鉴中已明显呈现出学科边界模糊、科际边界整合的趋势。就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而言,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这二者在社区研究领域已出现殊途同归的趋势,特别是人类学的“进城”——都市人类学的兴起、形成和发展,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态势。西方人类学对城市族群社区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代表人物有林德夫妇在 30 年代对美国中部城市的研究。他们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对城市社会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经济状况、社会角色,人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价值观念等做了整体性研究,出版了《中镇》(Middletown)一书。另一位先驱人物是华纳(W. Liogd Warner),他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美国城镇的小社区,出版了《杨基城》系列丛书,从而开创了美国本土都市人类学的先河。第三位代表人物是深受华纳影响的怀特(William Foote White),他曾任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主席,代表作《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①是对波士顿的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的实地调查,揭示了“街角帮”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

^① [美] 威廉·怀特著,黄育馥译:《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系。《街角社会》是早期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进行城市社区实地研究的杰作,“是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他开辟了在城市中进行实地研究的新领域,并确立了研究标准。”^①在怀特之后是甘斯的《都市村民》,主要研究都市的族群性和非都市社会组织及其关系模式,同时比较了都市生活和郊区社区生活的异同。人类学家维迪奇(A. Vidich)和社会学家贝赛马(Joseph Bensman)合著的《大众社会中的小镇》(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一书被称之为西方都市社区研究的典范,该书是对纽约州城市社区的研究,尽管研究中突出地强调了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但是其观点将小镇视为大社会系统的一分子,强调社区与州、国家的关联,这无疑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之所以被视为典范著作,也是两个学科相结合而迸出的火花。^②尽管这一时期怀有很深的乡村情结与“异文化”恋旧心理的传统人类学者指责这种“都市转向”的研究是对人类学的背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西方人类学家不能再自由地出入“野蛮世界”,同时又必须面对西方城市社会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人类学“都市转向”成为“青山遮不住”的必然之路。到20世纪60年代末,都市人类学应运而生,其标志是:在美国全美人类学会之下成立了都市人类学学会,专业杂志《都市人类学》、《城市与社会》定期出版,许多都市人类学著作问世以及英美大学中普遍开设都市人类学课程。这种研究的“都市转向”既是人类学在西方社会回归本土——从“异文化”研究向“本文化”研究的逆转,又是人类学史上“田野”工作从原始民族研究—农民社会研究到城市社会研究的第三次革命。^③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市人类学实现了以“异文化”研究为取向的传统人类学与以本土社会研究为取向的社会学的结合,形成了以城市社会与族群为研究对象的边际学科视野。

二、都市人类学与中国城市少数民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与西方人类学接轨、借鉴、对

① [美] 威廉·怀特著,黄育馥译:《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3页。

② 参见周大鸣:《现代都市人类学》,7~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另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578~579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③ G. M. Foster and R. V. Kemper eds. 1974, *Introduction: A Perspective o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Cities*, ppl~17, Boston: Little and Company.

话中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社会“民族问题”的呈现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都市人类学得以在中国诞生。1990年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会议在北京召开，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成立，并“挂靠”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更显得意味深长，定期出版《都市人类学通讯》，一些大学先后开设“都市人类学”课程。1997年周大鸣先生较系统的都市人类学理论著作《现代都市人类学》问世，同时不少学者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约20篇探讨都市人类学的文章，这些成就无疑可视为中国都市人类学诞生的标志。之后，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先后出版了数种反映我国城市少数民族的著作，如阮西湖主编的《都市人类学》，李德洙主编的《都市化与民族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中国都市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杨侯第主编的《中国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态》、《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散杂居民族工作概论》以及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编的《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等。尽管有学者强调人类学的独特性，并提出都市人类学与社会学如何区分的问题，甚至有学者将都市人类学定义为：“都市人类学是研究都市少数民族、都市退化、大众不满意问题的学科。”^①但是我们绝不能无视都市背景下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涉与叠合。就这一点，作为当代中国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重镇”的北京大学将其定位于“社会人类学”似乎更具启发意义。他们研究中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运用以“实践”说明了学科边际的整合和学科方法的互参与综合运用，同时体现出这种边际学科研究的优势。实际上一门学科过分强调其独特性，孤芳自赏就会阻碍学科自身的发展，对于人类学也是如此。人类学的“进城”不仅使传统人类学对异文化与本文化研究取向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使传统人类学面临新的挑战，实现学科新的综合与提升就成为一种必需。这一点如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所说的：“当前人类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对学科进行分割，而应当努力建立一种综合研究人类文化的广义的‘人类学科’（anthropology）”，“单凭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就能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必须具备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假如不能像博汉南、吉尔兹和道格拉斯那样同时成为一名深刻的思想家，那么就无法对大量的实际材料作

^① 周大鸣：《现代都市人类学》，1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出真正科学的分析。”^① 笔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的研究自然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城市少数民族及其社区非常不同于乡村少数民族的“分立群域”和社区的“时空坐落”，更不同于“特洛布里恩岛”，而是深深地内嵌于国家与社会的关联之中，密致地罗织在城市法定社区、业缘社区和物业管理社区之中，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变迁的发生总是呈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之中，游移在城市法定社区和业缘社区的网格之内。因此，我们无法从这种关联和网络之中将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剥离出来做“独特性”的研究，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对西北地区城市回族社区的人类学研究正是试图借助于边际学科视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语境下，在城市法定社区和业缘社区的网格交织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探讨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

第二节 研究的主题、思路与意义

1998年，因参加我的导师杨建新教授主持的兰州市建委的课题，我走进了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在高楼林立的小巷，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装扮的城市夜色下，在文化同质与差异相得益彰的城市镜像中，在宽衣长袍、素服淡妆与袒胸露背、浓妆艳抹的各美其美的城市风景中，甚至在乡土的底衬上反观“自我”——一个“今非昔比”的城市化的“我”时，当我第一次用学术的目光打量“人流如织”的城市轮廓时，我切身地感到了城市文化的宽容与变迁的魅力。同时这种“景致”对于传统人类学、民族学来说也是一种诱人的学术魅力，民族学的惯性路径与个人的学术旨趣，使我选择了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决意走进“她”的深处。当我检索研究资料时，我竟然发现在城市社区研究成为社会学的热点时，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却被视而不见；都市人类学虽然对城市少数民族研究情有独钟，却也是“情窦初开”。2002年，我以“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为题向国家民委申报课题并得到了资助，都市文化的魅力、学术旨趣和因缘使我在阅读、品味城市文本中开始了本书的选题与写作……

^① [日] 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66页、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一、社会学和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研究

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长期关注的一个领域，是社会学管窥社会变迁的基本视点。近几年来，社区研究特别是城市社区的研究日益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这一学术“焦点”问题的出现，首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关。表现在城市社会由于体制改革导致原有“单位制”的式微与解体，二元社会结构的松懈以及社会个体自主性、流动性的增强，致使国家既不能通过原有“单位”来控制国家管理社会的微观基础，也无法通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来重新整合社会成员。同时，原有“单位”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触角”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分离与下沉又必须寻求新的依托，“社区”就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诚如当下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和万能市场“失灵”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作为国家与社会联结点的“单位制”解体的基础上出现的，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重新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再造。^① 因此，正是这种社会需要推动了具有“理世情结”的社会学对社区研究的情有独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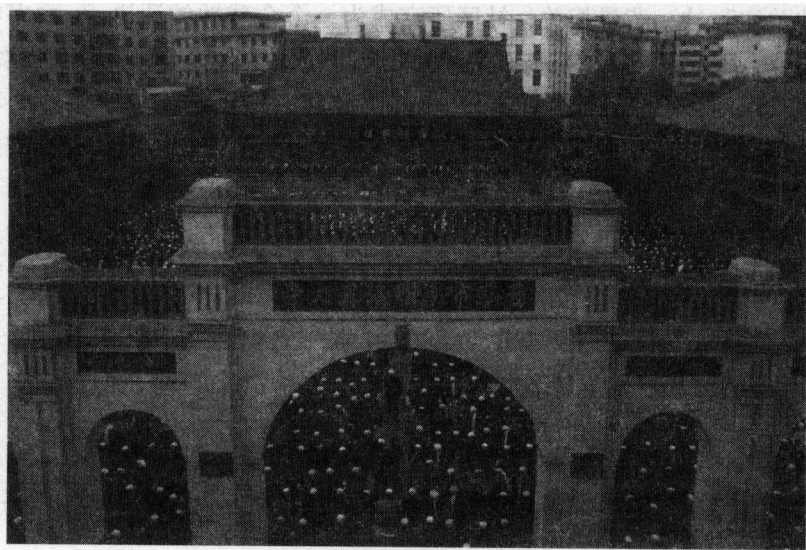
其次，我国社会学家对社区的聚焦又与全球范围内的“第二次对社区的关注”这一背景相关，社区研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语。^② 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又成为社区研究的新趋向。然而，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困难问题，不仅在于社区的“硬件”问题，更在于社区建设的“软件”问题。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改革开放以前，长期的国家对社会垄断而造成的社会自主性的缺失。而社区建设的基本方向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言的是基于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之上的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③，也就是说，社区建设的根基在于“草根民主”，而由于社会自治性的长期缺乏，本质上造成了这种社区赖以生长的“草根民主”的虚置。这应该是当代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另一方面造成社区建设进退维艰两难困境的是：一是社区软件即社区“共同体”——基于文化认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社区共同性的难以建构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的流动难以实现社区

① 《2001：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载《社会学研究》，2002（2）。

② 《2001：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载《社会学研究》，2002（2）。

③ 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载《社会学研究》，2002（4）。

的整合和形成社区认同；二是原有单位制的解体分离出的很多社会功能又需要这个仍然缺席的名不副实的社区来承担，这个不堪负重的弱小社会事实上将这些社会职能“悬挂”起来，成为“社会问题”，从而迫使政府又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造成的后果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发生的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又出现了逆转，引发了国家的再度膨胀，出现了国家权力的延伸，呈现出国家再度承包社会的趋向。典型的个案是被全国很多城市正在效仿的上海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社区建设模式。但是，需要指出社会学研究在关注法定社区、业缘社区（单位社区）以及市场条件下“新社区”再造的同时，完全忽略了作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特别是在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热潮中，存在的“一刀切”的现象完全将历史上就在城市中存在的少数民族社区完全排除之外，也就是说，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普同化没有给这些族群社区留下合理性的空间，完全忽视了社区建设中的特殊性。然而，社区建设又并非是无本之木。诚如费孝通教授指出的：城市社区建设“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以前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要认识到事物的连续性，要研究历史和现状，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提出好的建设方向，确定未来的目标”。^①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举行开斋节会礼 杨文炯摄

① 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载《社会学研究》，2002（4）。

根据笔者的调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区经历了民间的重建、恢复和发展,已发育成为都市中的另类社区。他们依靠共同的地缘空间和民族文化认同、共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依托社区中心形成社区整合,这种社会整合就是社区道德秩序的自然生成,社区成员在共同的信仰和情感基础上,通过社区仪式、习惯和自身传统等内部互动形成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所说的“机械团结”,这种“机械团结”就是面对面的、建立在共享的规范与制度(institute)基础上的“社会整合”,也亦如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言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生成的社区秩序和天生的和谐状态,他是建立在自然情感的一致性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之上的,是一种具有亲密关系、守望相助、极富人文关怀与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这一类型的社区所表现出的“成熟性”与目前政府推动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中的“软件”困难形成明显对照。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完全是罗织在法定社区和单位社区之中,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族群社区民间的重建正是在这种罗织的关联中展开的,建构了自己的“时空坐落”。而目前城市社区的建设不仅没有顾及到这类社区的独特性而给予合理性的生长空间,而且在社区建设中缺乏与这一类型社区的良好互动,从而造成了在许多存在这一类型社区的城市建设中的不应有的困难局面。大多数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借城市改造之机,将原有城市中的聚居的少数民族社区打散,重组社区与社会再造。事实上,这种不借用原有社区传统的社区建设的做法不仅引发了许多社会冲突、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等社会问题,而且提高了社区建设与社会再造的成本,为新社区的整合增加了困难。同时,城市中少数民族基于共同文化与族群认同之上的社区自我建设,表现出的社区“共同体”和良好的社会整合又为目前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困境即如何缔造具有自主性的社区“共同体”及社区整合提供了启示和鲜活的参照系。因此,在笔者看来,对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对现下城市社区的建设以及发展城市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本书选题的背景、思路和意义之一。

二、人类学、民族学和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研究

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对城市少数民族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进城”在学术上和国际接轨相关,二是更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多民族化事实之彰显及“城市民族问题”重要性日益突出相关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同样快速增长,城市多民族化现象愈来愈突出。据统计,到1999年,我国城市散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高达944万,全国668个城市均有少数民族分布。尤其是大中城市,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形成了成百上千个大小不一的城市“飞地”——少数民族群落。与大批少数民族进城相对照的是:城市世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城市的改建扩建逐渐走向散化,一方面是入城的少数民族搭建新的社区,另一方面是原有的少数民族社区的解体。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城市成为我国各民族交流、互动、涵化及多元文化竞相呈现的大舞台,展现在城市镜像中的景观之一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而另一方面却由于“城市化的困难”或各民族如此大面积、深层次地“接触”而产生的文化不适和文化冲突。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发生的纠纷和事件一半以上在散杂居少数民族之中,尤其是城市,事件一旦发生,由于城市功能的“核裂变”效应往往辐射和波及到民族聚居区乃至全国。正是这种“城市民族问题”的突出引致我国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最显著的例证是由国家民委牵头的城市民委主任联席会议制度的确立,从1987年到2000年共召开了11次全国城市民委主任联席会议。如2000年11月在深圳市召开的第11次城市民委主任联席会议,会议指出:城市是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中心,也是联系各地的交通枢纽,荟萃了大量的各类人才,在对内外联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西部大开发中,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举足轻重,要充分认识城市的窗口、示范、带动、辐射、桥梁、联谊的作用,充分认识城市民族工作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①正是如此,近几年来我国都市人类学研究关注城市少数民族并形成不少成果,弥补了社会学城市社区研究的缺失。

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的拨动下,城市多民族化是我国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深层次打造。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文化相互冲突、对话、理解、借鉴、和谐的过程。因此,关注与研究城市民族及其文化变

^① 杨侯第主编:《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21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